

May 2015

Modernist Imagination of Space and the Hardship of Returning Home: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Literatur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angzhong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 Changzhong. 2015. "Modernist Imagination of Space and the Hardship of Returning Home: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Literatur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5, (3): pp.51-6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3/7>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空间的现代性想象与“返家”的艰难

——以当代中国小民族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李长中

摘要:一般而言,我国小民族的生存空间相对狭小,文化承载能力不足,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文化传承载体相对匮乏。故此,他们的生存空间与文化空间其实就构成了一体两面的问题。在现代性进程中他们的空间很容易被外来他者所蚕食。作为外来文化的典型隐喻,外来他者空间及其表征者——“闯入者”的大量涌入,在破坏小民族生存空间的同时,也间接解构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对他者空间的想象是为了建构自我,“何处为家”成为小民族群体的现代性焦虑。当代小民族文学正是在对他者空间的现代性想象与“返家”的双重焦虑中,呈现出地方性的审美意蕴与文化精神。在当前中国文学创作越发呈现出“去域化”、“文化同质化”趋势语境下,丰富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维度与深度,彰显出中国文学的多元与多源特征。

关键词: 空间; 小民族文学; 家园; 他者

作者简介: 李长中,文学博士,阜阳师范学院文学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项目编号:13FZW034]的阶段性成果。电子邮箱:15055844618@163.com

Title: Modernist Imagination of Space and the Hardship of Returning Home: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Literature of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bstract: The capacity of cultural bearing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China is relatively weak, thei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latively fragile, and vehicles of cultural heritage relative scarce,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two-sided problem comprising of existential and cultural spaces. These spaces are gradually invaded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by the foreigners who, as the cultural Other, have not only contaminated the aboriginal space of existence with their physical presence but also undermined the indigenous cultural tradition through their representatio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s space helps confirm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hood, but the question "where is home" becomes the modernist anxiety for the ethnic groups communities. In the dual anxiety consisting of the modernist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s space and the search of homeland, the literatures of these ethnic groups display their local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spirit, and they have also enriched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multi-ethnic entity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homogeneity.

Keywords: space, literature of ethnic group, homeland, the Other

Author: Li Changzhong, D. Litt., is a professor in Fuyang Teachers College (Fuyang 341200, China), with academic interests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15011844618@163.com

一般来说,我国小民族^①大多生活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闭塞的高山峡谷、大漠纵横、林密草深、河流密集等边缘空间区域,在这一特定空间内塑造了他们对生态环境的感知方式、认知方

式和思维方式。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个体生活在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群体传统上手与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

为,到呀呀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是他的戒律”(本尼迪克特 5)。小民族群体与其生存空间与生俱来的水乳交融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生命体验及生存智慧,很容易内潜于小民族群体的生命深处而成为他们的“血液记忆”及维系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内在规约和生命禁忌,形塑着小民族与生俱有的自然观、生态道德观与价值观,与生态环境血脉相通的地域文化、信奉的以“万物有灵”为核心的宗教文化、丰富复杂的民间习俗、规约禁忌、仪式歌舞等形构的民族文化传统等无一不烙上源自他们生命体验的空间意识,并能够使这种空间意识升华为一种类似宗教情感的力量,建构着他们在特定空间内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自然与自然关系时所秉持的价值取向、生命准则、言说方式及集体文化记忆等,维系并生产着他们明确的“地方感”,按照迈克·克朗的观点,“地方感”不同于“地域感”的本质在于:“地方感”是一种家园归属感,是一种价值认同感,“地域感”仅仅是一种地理空间意识。这种“地方感”也使得小民族群体形成了他们与空间相适应的民族文化体系和民族心理象征体系。

也正是因为小民族的生命记忆及其文化传统与特定空间息息相关,一草一树的枯萎,一鸟一兽的死亡,一山一水的破坏,一词一语的更新,在汉民族群体和作家心中可能是无关紧要的,是不会关涉到民族文化存续与否的深忧隐痛的,但在小民族群体看来,却是灾难性的,可能隐喻着一种文化的消亡、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文化根基的毁灭。如裕固族作家铁穆尔所说“随着这一支古老的游牧文明的终结,一种在亚欧大草原上孕育而成,然后又绵延了数千年的一种独立不羁的精神、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对大自然的爱和正义感、一种对世上的万世万物充满爱和温情的非常天然的心灵都将无踪无影”(“失我祁连山”163)。就此意义而言,生存空间的稍许改变对小民族来说就可能成为危及小民族文化,乃至小民族自身生死存续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空间的改变与生命的灾难、文化的灾难对小民族来说就成了一体两面的问题,小民族群体与其他民族群体对空间体验的根本不同,其原因就在于此。

一、“过去——现在”书写中的空间焦虑

随着现代性话语在中国当代社会的整体推进,以时间的同质性来收编和改造空间差异性的现代性方案不断挤压或蚕食各边缘或小民族群体的生存空间及其文化传统,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向,结果导致小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既表现为生态环境的破坏,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圆融状态被摧毁,也表现为小民族群体因生态恶化、家园丧失而产生严重的精神焦虑、文化传承焦虑等。在这一过程中,“空间”丧失与身份无依成为小民族群体现代性经验的最显性症候。普米族诗人曹翔的《雨悄悄来临》一诗真实揭示了现代旅游开发带给小民族自然及人文生态的双重摧残,“湖岸百年古树披上了闹市灯光/散发不容察觉的忧伤/在灯火的升腾中/在黑夜的喧嚣中/来得很猛”(45)。现代化发展的日渐加速,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必然会对其文化传承系统造成损伤。“来得很猛”无疑是对小民族难以承受现代性冲击这一问题的艺术化概括,以及这一冲击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和文化消解后的“忧伤”。为了纾缓或强化这种现代性“忧伤”,当代小民族文学几乎都在建构着“过去——现在”这一二元化对比性的叙述模式。在毛南族作家孟学祥《永恒的寄托》的叙述者看来,早年“故乡的山永远都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绿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叙述者却发现“原本长树的地方都挖成了地,远看如大山上一道又一道的伤疤”(111-115)。农业文明的强势入侵、现代生产方式的被迫选择(当然也有他们主动追求的成分)、经济利益的无节制索取等严重侵蚀了原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毛南山乡,传统生态意识的渐趋淡漠和现代商品社会价值观的入侵,毛南族山乡的生存空间及人文价值系统均遭到严重破坏。故此,有学者认为,小民族生存问题,主要是由外部环境急剧变化而他们的传统文化不能有效适应引起的,而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往往是周边的一些强势民族造成的。小民族的弱势状态既有自身的诸多因素,更有其他民族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改变甚至侵占了小民族生存的环境和地域,使他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被剥夺而造成的(何群 82)。

出于对空间解体以及由此引发的传统文化流

散这一现实焦虑的在身性体验,当代小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便往往以传统空间的诗意回望作为判断当前问题的参照坐标并使之承担起文化再造的重负。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坚持以“虔诚的态度敬重脚下的土地及古老的本土文化”作为他“前行的动力”(《呼伦贝尔笔记》226)。他曾说,“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传统的生活已经发生变化,社会交往的频率加快,不同文化的接触面越来越宽,主流文化的影响力足以‘摧枯拉朽’,文化的覆盖已经不是局部的事情。这时候,人口少、居住分散的民族,他们的习俗、语言、历史和传统都面临着散失,或者说面临着消散的危险。这一现象在90年代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宝贵敏 巴义尔 46)。他在《丛林幽幽》中的叙述者同样说,“过去,鄂温克人的先辈将这种回报的心愿祭献了山神,可山神啥模样,现在连孩子都不信了”(乌热尔图 188);《萨满,我们的萨满》的叙述者“我”小时候,“林子是一座连在一起的会变颜色的矮山,它有时是黑的,有时是绿的”,但是,仅仅过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的达老非萨满就预言“不久的将来,林子里的树断了根,风吹干了它的枝,太阳晒黄了它的叶[……]不久的将来,鸟儿要离开林子,像秋天的松果甩开枯枝”(乌热尔图 158、162);《你让我顺水漂流》中那个“脑袋里装的东西,比你一辈子啃过的骨头还多”的卡道布老爹,因担心死后找不到可以风葬的树而甘愿死在叙述者“我”的枪口之下!(乌热尔图 113)。出于对“空间解体”这一触及灵魂的感伤,乌热尔图的前期作品几乎都是通过“从前/现在”、“老人/孩子”这一叙事模式来呈现鄂温克族在现代性发展中的空间遭遇问题。鲁若迪基、曹翔、和建全、苏国荣、陶玉明、彭兆清、高文明、罗荣芬、孙宝廷、林华等小民族作家的作品都是以对传统生态场景的执着呼唤和诗意建构作为基本叙述主题及叙述结构。然而,从前的记忆只能作为记忆留存,现实的无力感还是使叙述者难掩内心的悲痛。为了凸显现代性后果的严重性,当代小民族文学不能不以“过去——现在”的对比性叙事模式来强化空间解体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文化流散问题。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当代诗人维佳在《我记得》中,以“我记得”/“那时”这一“过去——现在”的连续性、对比性叙述表达了本民族游牧文

化、狩猎文化与驯鹿文化日渐式微的哀伤,以及对生活日益贫困的忧虑,“我记得/幼时/跟随母亲/沿敖鲁古雅河而上/骑着驯鹿来到乌力楞/我还记得/他们向着东方火红的太阳/唱着感恩的歌/歌声包含着/鄂温克语言全部的美丽/我还记得[……]”^②布朗族作家陶玉明在《江边山》以“过去——现在”这一对立场景的设置呈现出布朗山寨空间恶化的现实。普米族诗人曹翔看到家乡精神的象征物——“格姆神山”、泸沽湖等因超规模开发引起环境污染加剧,以及母语的飞速流失、生存地区不断被打造成旅游景点等而彻底地改变着诗人的家园及其所牵系的传统文化,最终使诗人体验到“在自己的家乡成为了过客”、“失去了故乡”等的现代性创伤“如今,家乡的泸沽湖/猪槽船/拼凑得越来越大/载着来自城市的喧嚣/穿梭在湖面的人流中/如今,家乡的泸沽湖/村庄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舅舅丢失了古老的渔网/年轻人划渡着兴奋的游客/在自己的家乡成为了过客”(《家乡的泸沽湖》12)。诗人在“过去——现在”这一当代小民族文学常用的叙事模式中痛苦地感到“神性”退场、生态不再面前的空间之殇。然而,在整个社会都处于均质化、同一化的现代性语境中之时,小民族群体短时间内却看不到问题解决的方案,“看不到向海的路”无疑是他们这一心态的典型表征。土族作家祁建青的叙述者在《三河流域》中说,“[……]走出历史的新三河,还将继续为现代、后现代生活浪潮充斥覆盖,那时的我们,也会一下子找不到回家的路?”(102)。如何为人类重新建构“诗意栖居”的空间,如何维系传统意义上的和谐家园等问题,直接促成了小民族文学对空间问题的探索。在这里,“家园”无法维系却又情感牵依,建构新的存在之根却又仅能获取表面的零碎的记忆片断,随后可能会陷入更深的精神失落之中。于是,对原本和谐生存空间的执着守护及其被损坏后的哀婉叹息,对造成空间解体的诸多因素及其后果的质疑或抗争,对空间解体背景下民族文化传统的想象性建构与诗意忧思,就成了文化流散状态下小民族作家重构现代民族身份的必要在场。也是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当代小民族文学对“最后一个”形象的悲剧性建构。

裕固族诗人妥清德在《一年中的最后一天》中以“过去/现在”的时空转换中,再现了裕固族

独特的生态文化及裕固人的空间意识。岁月已逝,生态不再,随着最后一匹“孤零零的马”离开草原,裕固族传统游牧生活便已成随风而逝的记忆,诗人不能不在留恋、惋惜与感伤中看到“孤零零的马鞍/离开奔跑已经很远/风吹进村庄/一年,一晃就过去了/除了尘土,还有炊烟”(妥清德 39)。于是,传统空间场域的破坏或消解不能不使小民族作家体验到一种源自大地的“疼”,蕴涵广阔阐释空间的“最后一个”式的意象营构无疑是这种“疼”的典型表征“风是这个季节的顽童/吹醒沙海黄色的眼睛/牧人抹一把/睫毛上的土/却抹不去落在草尖上的黄尘/羊群开始集合/马蹄踏着大地的疼!”草原对牧人来说,不仅是一种安身立命的生存与生活的地理空间,更是他们维系身份和传统的精神家园和心灵住所。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代代传承的草原文化亦面临解体风险,扎斯达尔在《一个人的部落》中对这一问题的描述更是触目惊心(《一个人的部落》题目本身就是民族解体、文化不再的隐喻)。^③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在《神话》中把生态恶化后人类“那滴——泪”看作是“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滴雨”;裕固族诗人贺中面对民族故土与传统的消失而无能为力,只有把写诗当作“最后的挣扎”;锡伯族作家郭晓亮在《风季》中甚至把风中那棵因生态恶化而仅存的“树”看作是“象征世界的最后哭泣”,以再现西部边缘地区环境不断恶化、土地不断沙化的残酷现实(25)。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旦起风就会引发持久的干旱和人类生存的艰难,最终使人感到“尊严消失殆尽”。^④乌热尔图几乎所有文本都在哀悼鄂温克族“最后一位萨满”或“最后一头熊”的死亡。他的《萨满,我们的萨满》中的达老非萨满总是与“破碎的落日”、“血色的余晖”、“遍地涂抹着血色的黄昏”或者“落日之后”、“昏黄的片刻”一起出现,等隐喻着无可挽回的悲凉;铁穆尔的文本是在深情缅怀部落里“最后一个唱古歌的人”、“最后一个尧熬尔”、“最后一个老人”等,彭兆清、孟学祥的文本也是对“最后一个仪式”、“最后一段历史”的沉痛悲悼,“最后”意味着难以为继,意味着往昔温情的缺席,意味着曾经独属于本民族的传统空间与文化已飘零他方,由此所引发的源于心灵深处的哀伤与苦楚是难以言表的。

二、“闯入者”作为传统空间的解构者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民族地区封闭或半封闭的传统文明逐渐走向工业化、城镇化与开放性的现代文明,由此形成频繁的人员流动与边界移动,“民族地区的发展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正是因为民族社会的转型是由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结构,同民族社会的结构域发展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麻国庆 37)。作为这一流动现象的衍生物,使外空间的“闯入者”及其所体现出的外来观念开始冲击(即使曾经生活在故乡但在经历过现代文明洗礼现已不在故乡居住的人,在小民族看来也难以与故乡血脉相通而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闯入者”),甚至危及到小民族传统意义上的生存空间及其在这一空间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念、社会秩序或族群关系等。毛南族作家孟学祥的《印象故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经典描述。《印象故乡》的叙述者说,作为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且已在城市生活多年的人,在一次回乡时发现,“几只狗在不远的地方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并时不时发出一两声低沉的吼叫,以此来提醒我这个站在老屋前的人:小心你的行动,你已经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了。”^⑤在小民族群体看来,这些携带着现代文明样本的“闯入者”才是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者、价值观念的解构者及空间秩序的冲击者,“闯入者”于是作为现代性的一种隐喻而受到小民族作家的普遍关注,并作为传统空间的解构者成为当代小民族文学现代性想象的经典形象。就这样,当代小民族文学表意的空间之维与“闯入者”书写的合谋在根本上成了“现代性”语境下民族身份言说的表征,“闯入者”叙述也成了小民族现代化际遇的一个隐喻,呈现出不同于汉族文学“闯入者”书写的另类面相。^⑥

小民族大多自然资源丰富,地域面积广阔。所以,他们的现代化发展多表现在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层面,随之而来的则是大量的外来“闯入者”进驻(“闯进”)小民族生存空间。特别是新时期之后,受“现代/先进——传统/落后”二元思维方式的潜在制约,现代性更是被烙上浓厚的价值观或道德观成分而愈加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并使之不断向纵深处推进。这一点可以从一则官方

资料中看出端倪。据鄂伦春自治旗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鄂伦春自治旗志》中记载,“传统的自然经济和旧的思想观念,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束缚着广大猎民致富奔小康的手脚;只有改变旧的思想观念,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才是促进自治旗经济建设发展快速发展的关键。1995年,四个猎民乡镇先后开办集体农场、个体农场达21个,耕地面积2万多亩。在猎民中涌现出了种粮大户,使过去吃粮靠国家的鄂伦春民族有了向国家售粮做贡献的可喜转变,在鄂伦春族历史上也首次出现了粮食自给有余。猎民观念的更新,多种产业的兴起,为广大猎民从猎业生产转向其他产业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和物质基础”(10)。“传统的”、“旧的”等是先进生产力的“束缚”、“阻碍”,只有“改变”、“新的”、“更新”,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上述话语的论述基础无疑是“现代——传统”二元思维的典型表征,其对现代化规划方案的乐观表述其实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小民族的生态承载能力,同时凸显出小民族现代性的“被动性”这一普遍问题。在“被动”进入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由于其速度和规模超出了小民族传统空间的承受程度而引起严重的空间焦虑,原本相对静态而纯粹的生存空间已渐趋松动或解体,“闯入者”对小民族传统空间的冲击与碰撞日益加剧,以及由此而生成价值焦虑或身份困惑成为小民族群体在现代性语境下的主导症候,对其生命本体与价值观念产生或显或潜的威胁,并危及到他们原初族群关系的维系。所以,当代小民族文学往往将笔墨集中于那些破坏生态环境的外来“开发者”。

乌热尔图新时期之初的作品犹如清晨的阳光,傍晚的薄雾,鸟的歌唱或天空如洗的云。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后,他的作品开始以“老人”或“成人”作为文本叙述者或主人公,以老人作为叙述者或故事讲述者是为了在“回顾性”叙述中表述着对往昔生活方式和传统生存家园的哀悼或寻找行为,力图在这种言说中保留原生态的民族记忆和民族意识,并在历时性叙述中蕴涵着对和谐生态不再的缅怀,对良好族群关系破坏的抵制。他的《玛鲁呀,玛鲁》、《在哪儿签上我的名》、《你让我顺水漂流》、《雪》等作品一再把“闯入者”称为掠夺者、破坏者,是欲望的象征,是病态的隐喻;裕固族作家杜曼扎斯达尔《游牧黑河》

的叙述者说,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和其他采药的、拾菜的、垦田的、开矿的等各类“闯入者”涌入,原本水流充沛、草场肥沃的祁连山“就像一位病入膏肓的牧人”(60);达斡尔族作家萨娜则把这些“闯入者”称为“不懂规矩的人”(152)。“不懂规矩”其实是那些不了解达斡尔人在长期与自然和谐相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图腾禁忌意味的、渗透着“神性”意识的生态伦理、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化者。她的《多布库尔河》是以各罗布等人的非正常死亡作为对外来“闯入者”进入多布库尔河而对被族人视为有灵魂的树木大肆砍伐而导致传统生存方式遭遇现代性危机的隐性书写。主人公古迪娅的“爸爸”缺失就是达斡尔族的宗教信仰和生存法则在现代性语境下缺席的隐喻!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在《失我祁连山》中甚至把这些“闯入者”称之为“侵略者”,是“人间地狱的制造者”,他的叙述者最后呼吁,“让那些在草原上肆虐的城市、让那些人间地狱的制造者都见鬼去吧!”(165)。在小民族作家看来,正是“闯入者”使得弱小民族群体无处为家,牛羊得不到喂养,山神得不到敬畏,传统空间得不到维系。随着“像刀刃一样”的公路(乌热尔图语)的修建,一些“闯入者”受市场经济利诱更是开始无所顾忌地猎杀、偷盗、贩卖小民族地区独有的生灵,严重破坏了小民族的生态禁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神共处关系。裕固族作家达隆东智的《猎人巴伯尔》、《苍鬃母狼》、《哈日凯勒》等作品都是对所谓的“偷猎者”的批判性描写。鄂温克族作家敖蓉的《古娜杰》为了强化对“偷猎者”的排斥或痛恨心理,采取了双重文本叠加式的叙述模式,即在文本表面的叙述者“我”在讲古娜杰的故事的同时,也让人物古娜杰讲述她或她的民族的故事。双重文本的共时性叙述把鄂温克地区因“偷猎者”的无节制、无顾忌打猎所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触目惊心(敖蓉 39-59)。撒拉族作家韩文德《家园撒拉尔》、《永远的家》、《永恒的河岸》、闻采《街子——撒拉民族之圣地》、鄂温克族作家杜梅《那尼汗的后裔》、鄂伦春族作家空特乐《绿色的回忆》、白石《老人的歌》、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童年》、《遥远的黑帐篷》、《北望阿尔泰》、《请把你的马拴在白桦树干上》、《焦斯楞的呼唤》、《苍狼大地》、《北方女王》、《草原挽歌》、《尧熬尔》等作品,寓言性题目本身就是对导致传

统生存空间及族群关系破坏的各种“闯入者”控诉。或者说,“闯入者”与小民族的生态恶化、族群关系破坏与传统空间解体其实就构成了一体两面的问题。

上述书写立场导致当代小民族文学的空间书写往往把本民族空间创伤的根源归因于本民族之外的外来“闯入者”。比较形象学学者巴柔认为,“他者形象不可避免地同样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我想言说他者(最常见的是由于专断和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定了他者,而言说了我”,所以,“所有对自身身份依据进行思考的文学,甚至通过虚构作品来思考的文学,都传遍了一个或多个他者的形象,以便进行自我结构和自我言说,对他者的思辨就变成了自我思辨”(123-24)。当代小民族文学对“闯入者”的抵制和自我重塑,无疑是源于对本民族共同体的执着建构,对文化传统再造的期盼。这就使当代小民族文学的空间书写与族群关系叙述民族文化流散问题叙述自然叠加在了一起,对空间问题的合法性叙述也就在深层结构上与族群关系的考量及自我民族认同相一致了。这样,当代小民族文学时常把“闯入者”叙事转化为一种古老民族文化景观被损害的症候,并以先行预设某种传统“复归”或“修复”作为叙述的最终指向。如大卫·哈维所说,“每个社会形构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material practice)但是社会会变化与成长,它们由内部转变,并且适应外来的压力和影响”(377)。萨娜在《卡克,卡克》中以叙述者“我”死于外来人枪口之下和小熊卡克被外来人困于铁笼之内而最终自杀隐喻着小民族与闯入者的对抗或对立。她的《多布库尔河》在第二节开始就向隐含读者讲述死亡的故事《流失的家园》中的娅娅,尽管从幼年时起就一直在“寻父”,但“父亲”却始终缺席。作为萨满的乌恰奶奶或“爸爸”的缺失,不就隐喻着传统生存法则和宗教信仰的解体吗!所以,在此类文本中,“死亡”(又往往表现为耐人寻味的“老人”死亡)成为一个时常出现的经典意象。乌热尔图的《萨满,我们的萨满》、《丛林幽幽》、《老人与鹿》等,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多布库尔河》,铁穆尔的《哪里还有静静的草原》、《北方女王》、《苍狼大地》等,艾斯别克·奥汗的《大象的眼泪》,吐

尔逊·朱玛勒的《猎人》,阿依别尔地·阿克乔勒《三条腿的野山羊》等作品都是以“老人”或“父亲”角色的死亡隐喻着传统空间解体以及少数民族在这一现实遭际中的惶恐或焦虑。意大利学者肇嘉从历史、心理和文化角度考察西方文学中“父亲”角色缺席问题时指出,“父亲”的缺席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特别自人类工业文明发展以来,“父亲作为一种意象,已经缺席了,甚至比作为一个个体更加缺席。缺席的父亲本身就是今天父亲的意象”(382)。作为信仰、力量和秩序的“父亲”角色的缺席,无疑是“闯入者”对小民族群体传统生存空间直接“入侵”的结果。当代小民族文学对“父亲”缺席的执着言说也就具有了悲悼文化流散与再次确证民族身份的寓言化意味。

三、“城市”空间的他者书写 与“返家”的艰难

大卫·哈维认为,“以界域地点为基础的认同,尤其在种族、族裔、性别、宗教和阶级差异相结合时,无论对主动的政治动员还是反应性的排他政治来说,都是最普遍的基础之一”(117)。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主体其实都生存于经过仪式化赋魅后的特定空间,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封闭、复杂且具有共同言说系统的文化结构之中,这也是“想象共同体”建构的基本条件。在这一空间之内,自我主体能够维系一种相对完整而稳定的认同意识和身份确证。对于人口较少的民族主体来说,无论是资源开发或“掠夺性”的动物捕杀,还是外来文化冲击,在还没能使他们彻底放逐于其先前的生存空间之时,在他们的主体或民族主体危机感尚不能从根本上危及到他们固有的身份意识之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小民族群体却不得不在这一进程中渐趋放弃原有的生存空间,生存空间的改变无疑将导致他们沦为“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因为,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城市化无可避免地带来许许多多的消极后果,传统空间的解体则是其中最为直接的灾难之一。也就是说,在城市化这一“巨型寓言”所形塑的空间结构中蕴含着与小民族传统空间绝不相同的族群关系、价值观念、交往准则及意识形态质素。两种不同空间的塑造其实是展示着两种不同的身份意识与文化立场,城市作为

“他者”空间与小民族传统空间也就存在着不同文化间的对立。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在《狼啸苍天》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触目惊心的描述,“亚欧大草原已被荒烟、新开垦的土地、工厂、无数的村镇、城市和沙漠湮没了、遗忘了,像是一个高大的汉子被肢解。如今,依稀可见游牧人当年风貌的地方已寥若晨星”(118)。由此,“城市化”作为破坏小民族空间的另类或隐性“闯入者”日益受到关注,对城市的抵制与拒绝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小民族传统空间解体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声援性关系,成为当代小民族文学空间书写的共有主题。就这样,民族问题与城乡问题、东西部问题、社会阶层问题等相互叠加,使“城/乡(草原、牧场、森林等)”的关系成了验证传统空间存在与否的显在表征。所以,当代小民族文学往往将“城市空间”看作是与传统家园截然对立的场域,并通过对“城市空间——出逃”与“传统空间——返回”这一行为的隐喻化书写来缅怀或回眸曾经和谐而温馨的传统空间,表征着小民族群体对城市空间内环境恶化、信仰缺失、价值失范的质疑、抵制与抗争。

就此意义而言之,当代小民族文学对城市这一“闯入者”书写的重心不在于如何写城市,写了城市的什么景观,而是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抽象或提纯来呈现它们的虚伪、世俗、废墟、无序,以此达到抵制或消解城市空间“入侵”的叙事目的。也就是说,小民族群体对城市空间的疏远、抵制或拒绝无疑潜隐着对本民族传统空间的诗意想象与深情缅怀,城市空间内的信仰缺失、价值失范、道德沦丧等恰好构成了对传统空间内温情、和谐、宁静等特质的二元式“入侵”,这才是当代小民族文学空间书写反对城市的根本缘由。鄂温克族作家乌云达赉的《玛塔津大娘的烦恼》表现了城市化进程使得民族传统优秀品质丧失的痛苦。“老人”在鄂温克族中占有重要地位,“老人”即智慧、传统,失去“老人”就意味着丧失智慧、偏离传统。而作品中玛塔津大娘的儿子扎格达和女儿娜尔斯在城市工作后却逐渐丧失了鄂温克族孝敬老人的美德,完全以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中心,把年迈的老娘当作沉重的包袱,彼此间推来推去,不闻不顾。杜梅的《木垛上的童话》、《那尼汗的后裔》也都揭示了原始的狩猎经济输给了商品经济后,传统和谐互助的族群关系遭到彻底破坏,最后只能使鄂

温克人陷入深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这一惨痛现实。基于这一叙事立场,当代小民族作家一再表达了对现代性及其城市化的犹疑或困惑。或者说,刻意夸大城市化的风险与威胁,一再张扬小民族传统空间的神性与诗意,并以此作为修复、重构和捍卫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生态手段,是当前小民族文学空间书写的基本叙事模式及书写心态。^⑦

表面上看,当代小民族文学尽管也时常关注本民族群体进入城市这一“他者”空间的问题,只不过囿于城/乡空间的二元式立场,当代小民族文学总是表述着小民族群体对城市这一“他者”空间的格格不入。撒玛尔罕的《山那边的世界》为此作了很好的注脚,“山那边的世界[……]没有欲望,所有的灵魂一贫如洗/甚至没有一行美丽的诗句/无尽的黑夜是最真实的世界/罪恶和虚伪呈现原本的面目无法遮掩”(90)。萨娜的《阿西卡》、《流失的家园》、《额尔古纳河的夏季》等无不表述着对城市空间的隔膜与拒绝。于是,小民族群体在城市空间中总是产生“迷路”或“逃跑”的冲动,反衬出小民族群体对传统空间的诗意想象与皈依的迫切意愿。鄂温克族作家敖蓉在《古娜杰》中甚至把小民族群体进入城市看作是“一种一只驯鹿误闯老虎洞的感觉”(51);裕固族作家玛尔简将城市化进程中的小民族群体称为“迷路的孩子”。“在城市熙熙攘攘的历程中,我也越来越疏远了故乡草原,可是每每看到故乡草原我就有一种负罪感,仿佛我忘记了长大成长的路,成了迷路的孩子”(“故乡谣”103)。作为对这一生活境遇的抵制,“我”产生一种“逃跑”的冲动,“在高楼与大厦纵横交错,叫卖声与汽车声此起彼伏的城市生活中,我总有一种想逃跑的感觉”(玛尔简38)。这一典型的“逃跑”意象在其他小民族作家作品中也不时涌现。裕固族作家阿勒坦托娅《风中的叹息》中的叙述者“我”中学毕业后离开草原到城市求学,但总感到生活在他处,随着城市体验的深入,“我”最终成了“一个真正迷失的女儿”(132)。撒玛尔罕在“山那边的世界”成了一只“迷途的羔羊”而渴望“只等你出现!带我走向回家的路”(90)。“隔膜”、“误入老虎洞”、“迷路的孩子”、“迷失的女儿”、“迷途的羔羊”等等这些极富阐释意味的现代性体验,一再表征着小民族群体在传统空间解体后的焦虑不安或无处为家的焦灼,以及他们对“城市空间”强烈的“出逃”意识。

对城市空间风险的肆意夸大与对传统生存空间的留恋缅怀就这样成了一体两面的问题,“逃出”城市空间在根本上是在诠释对传统空间的诗意向往与归属情结。所以,当代小民族文学一再重述着如何“返回”的现代性焦虑。

对小民族群体而言,城市空间与其传统空间之间又不仅仅只是价值观或文化层面的区别,小民族群体因其在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等方面的弱势而使他们在城市空间的就业难和生存难问题中相当突出,再加上城市空间有意或无意的种族不平等意识在作祟,“他们很容易把自己的生存困境与族际差异联系起来,这就使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民生问题与民族隔阂叠加在一起,从而使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化”(马戎4)。也就是说,对小民族群体来说,他们在面对的城/乡空间问题时往往将之与民族问题、社会阶层问题等相叠加。基于这一叙事伦理,试图从城市中逃离而返回“故乡”并以此作为建构民族身份,回归原初诗意空间的基本背靠,就成了当代小民族文学空间书写的基本形态。萨娜的《额尔古纳河夏季》中被都市折磨得身心疲惫,伤痕累累的北奇,只有走进北方广阔的草原才能找到爱和自己;《流失的家园》中的娅娅,在看透了城市文化中的虚伪、冷漠和苍白之后,只有到“故乡”去“寻父”,才恢复了生机和活力,并认为这才是“自己不能拒绝的沉重的使命。”“返回”也成了小民族群体在现代性生活场域中主动后撤的主体症候。“我紧扣衣领/独自穿越长安街/我应该在哪儿栖息/某个城市牵挂人心/某个人无声无息/某个字逐步丧失/你说:返回吧/你说:你自由了/从此以后,你到哪儿/这间房子真大/它被陌生的月光包围/道路消失,兄弟/我无论怎样/总要穿过长安街,因为/你说:返回吧/因为你说:你自由了”(贺中54)。在诗人看来,尽管城市里的房子“真大”,城市里的生活“自由”,城市里的“道路”宽广。但是,城市里的关系“陌生”,城市里找不到可以“栖息”的空间。诗人正是在“城市/乡土(草原、牧场、森林等)”这一对立场景设置中看到了城市空间内族群关系的病候而一再强调“返回”。

然而,在整个社会都已被纳入现代性话语逻辑之中之时,我们一定能够回到梦中的家园吗?土族作家东永学对此作了回答,“从城市中回到梦牵魂绕的故乡,你就能找回曾经拥有的所有吗?

不可能。回去除了和几个土族老人说几句土语,我在土汉混杂的这个小山村里几乎找不到本民族的多少痕迹”(58)。叙述者在“从前——现在”这一对比性叙事结构中,描述了“拜天地”、“编辫子”、“服饰”等三个本来最能体现民俗风情的民族文化在当前语境下的消解,沉痛地看到了城市化裹挟下民族传统的危机,并一再表达着“这种乡村景观消失了,一种景观消失的背后潜藏着某种危险”的痛楚忧思。鄂温克族女作家德纯燕以《异乡人》为题已然表述着“在自己的故乡却成了陌生人”式的尴尬与荒诞,“我的户籍在草原,可是我却一直却固执地认为漠河是故乡。但是,现在又突然意识到,漠河也不是故乡”(1244)。布朗族80后诗人郭应国甚至以“故乡丢了”为题表述了“返回”已难以成行的哀痛。在城市化的不断进逼中,诗人的“故乡丢了”,在城市中接受到的现代文化却“像一支/冰冷的猎枪,疼醒/荒原的狼故乡确实丢了/寄不出的思念,在异乡的/口袋,烂成一堆煤。”“现在,我已负债累累,历史鞭打成/一块块汗疹/我透支完了冬天,透支春天,透支完了黑夜/透支阳光,在这里/请不要说我贪婪/流星划过,我的愿望依然是透支一辈子/而后整整齐齐地还给故乡/”(郭应国125)。

如何才能回到梦想中的“故乡”?“故乡”是建构的还是本质的?作为在现代性语境下孕育而成的生命个体还能否“整整齐齐地还给故乡”?这是小民族作家思考空间问题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探索一条对话与相恰的途径或方式,才是消除小民族群体对城市的恐慌或畏惧、建构新形势下良性健康族群关系与社会秩序的根本。不了解这一点,小民族群体仍将不得不一直在“流散”中奔波和寻找。

注释[Notes]

① 国外学界将人口较少、文化相对简单的民族,称为“小民族”、“少小民族”等。我国学界亦称之为“小民族”、“弱小民族”等。200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将人口较少的民族统一命名为“人口较少民族”。目前,我国“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民族,分别是:珞巴族、高山族、赫哲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门巴族、乌孜别克族、裕固族、俄罗斯族、保

安族、德昂族、基诺族、京族、怒族、鄂温克族、普米族、阿昌族、塔吉克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景颇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佤佬族、土族。本文所谓的“小民族”即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以区别于人们习惯上理解的“少数民族”,此后不拟另作解释。“小民族文学”因其文化承载人口较少、生产生活方式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转型更为剧烈、民间口头传统较为发达等因素,呈现出地方性知识特征,已成为中国文学重要且独特的文学现象。不过,对这一文学新类型,学界尚缺乏应有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小民族文学价值的敞亮与发现。

② 这是摘自鄂温克族青年女作家德纯燕转发给笔者的,诗人维佳的诗集《我记得》CD中的诗句,特向诗人表示感谢!

③ 此两篇作品摘自扎斯达尔发给笔者的电子邮件。

④ 如果我们对当代小民族文学的题目进行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的作品题目本身就蕴涵着浓厚的生态意识,普遍具有典型的隐喻意义。如裕固族诗人妥德清的《一年中的最后一天》、扎斯达尔《一个人的部落》、鄂温克族诗人维佳的《我记得》、撒拉族诗人撒玛尔罕的《这片草原缺少一种生机》、普米族诗人曹翔的《揪心喜欢》等等。

⑤ 摘自孟学祥的个人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444d110100f4iy.html)

⑥ “闯入者”其实是现代性的一种隐喻,“闯入者”叙事作为一种现代性叙事模式,是新时期之后中国文学的主导叙事模式。在新时期之后的汉民族文学的叙事结构中,“闯入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启蒙与被启蒙、拯救与被拯救等二元式对立关系最终都隐喻为男性/女性间关系。男性作为“闯入者”即使在启蒙他者的过程得到失败下场,“闯入者”所坚守的价值观、道德准则仍是他者所欠缺的东西。刘恒的《苍河白日梦》是这一症候的典型文本。主人公曹光汉的命运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救世神话的溃败。事业失败、妻子偷情,并最终因刺杀长官被绳之以法,但曹光汉所代表的先进知识理念仍是文本所推崇的“自我”,而作为文本批判的对象致他失败的所有因素则是“他者”。在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闯入者”叙述中,因生存地域、生产生活方式、民族传统文化等的相对封闭或隔离等原因,而对“闯入者”的书写心态较为复杂。外来文化的多重冲击与文化传统的守护使“闯入者”自身成为“他者”。

⑦ 笔者在考察当代小民族文学时发现其题目本身就是重建和谐生态、回归原生态空间场景的隐喻,蕴涵着对现代化或城市化的质疑心态。如撒拉族作家韩文德《家园撒拉尔》、《永远的家》、《永恒的河岸》、《歌颂土地》、《撒拉人的黄河》,闻采《街子—撒拉民族之圣地》、《故乡的古榆》,马丁《默读乡村五首》,鄂温克族作家杜梅《那尼汗的后裔》,阿昌族作家曹先强《远山童话》,普米族诗人鲁诺迪基《泸沽湖之恋》,蔡金华《南方本土》,尹秀龙、尹善龙《乡情的独龙河》,和平的《阿妈的头帕》,《父亲的马铃薯》,毛南族作家谭亚洲的《毛南山情》,谭征夫《大山恋

歌》,鄂伦春族作家空特乐《绿色的回忆》,白石《老人的歌》,敖长福《出猎》,怒族作家彭兆清《相约在雪山释道》,赫哲族作家晓寒《在天鹅的故乡》等。裕固族诗人贺中的《我与世界的争头如此漫长》、《多么喧闹啊,可又是多么寂寥》、《无法言明自己奇异的感受》、《我的伙伴你又醉倒在哪个山岗》等,上述文本的题目本身都是通过城/乡空间的不同书写以及对城市空间的自觉拒绝而蕴含着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阿勒坦托娅 “风中的叹息”,《裕固文艺作品选》(散文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

[Aletantuoya. “Sighs in the Wind.” *Art and Literature of Yugur: Prose*. Lanzhou: Gansu Culture Press, 2007.]

敖蓉 “古娜杰”,《青年文学家》16(2009):51。

[Ao, Rong. “Gunajie.” *Youth Authors* 16 (2009): 51.]

达尼埃尔·巴柔 “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BanRoan, Daniel. “From the Cultural Image to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Imagolog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 Meng Hu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宝贵敏 巴义尔 “昨日的猎手——与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对话”,《中国民族》12(2007):46。

[Bao, Guimin, and Bayier. “Yesterday’s Hunter: A Dialogue with the Ewenki Writer Wure’ertu.” *Chinese Nationalities* 12 (2007): 46.]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Benedict, Ruth. *Patterns of Culture*. Trans. Wang Wei,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曹翔《家乡的泸沽湖》。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

[Cao, Xiang. *The Lugu Lake in Hometown*. 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雨悄悄来临”,《诗刊》6(2007):45。

[——. “Rain Coming Quietly.” *The Poetry Journals* 6 (2007): 45.]

鄂伦春自治旗志编纂委员会《鄂伦春自治旗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

[The Compiling Committee of Oroqen Autonomous Banner’ Record. *Oroqen Autonomous Banner’ Record*. Hohhot: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德纯燕 “异乡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散文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

- [De, Chunyan. "The Stranger." *Literary Works from Ethnic Minority Groups Selected i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New China: Prose*. 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东永学 “随风远去的记忆”,《中国土族》1(2011):58。
- [Dong, Yongxue. "The Memory Gone with the Wind." *Tu Nationality in China* 1(2011):58.]
- 杜曼扎斯达尔 “游牧黑河”,《六盘山》4(2011):60。
- [Dumanzhasidaer. "The Nomadic at Heihe." *Liu Pan Shan* 4(2011):60.]
- 郭晓亮 “风季”,《西部》5(2011):25。
- [Guo, Xiaoliang. "Wind Season." *The West* 5(2011):25.]
- 郭应国 “我的故乡丢了”,《民族文学》5(2013):125。
- [Guo, Yingguo. "My Hometown Is Lost." *National Literature* 5(2013):125.]
- 大卫·哈维 “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包亚明主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 [Harvey, David. "Between Space and Time: A Reflection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Modern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Ed. Bao Yaming.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 何群 “现代化与小民族生存问题探讨”,《云南社会科学》1(2006):82。
- [He, Qun.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Issues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Survival of Small Ethnic Groups." *Yunnan Social Sciences* 1(2006):82.]
- 贺中 “世纪末记事——最后的挣扎”,《西藏文学》5(1994):54。
- [He, Zhong. "Chronicles at Fin de Siècle: The Final Struggle." *Tibetan Literature* 5(1994):54.]
- 玛尔简 “故乡谣”,《民族文学》2(2012):103。
- [Maerjian. "The Ballad of Hometown." *National Literature* 2(2012):103.]
- :《我的家园》。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 年。
- [---. *My Hometown*. Beijing: The 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08.]
- 麻国庆 “生产方式及其衔接: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评析与启示”,《民族研究》1(2014):37。
- [Ma, Guoqing.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Cohesion: The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Western Marx Ethnology." *Ethnic Study* 1(2014):37.]
- 马戎 “21 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领导者》4(2011):4。
- [Ma, Rong. "Is There the Danger of National Division of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Leaders* 4(2011):4.]
- 孟学祥 “永恒的寄托”,《山路不到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 [Meng, Xuexiang. "The Eternal Sustenance." *The Endless Road of Mountain*.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祁建青 “三河流域”,《民族文学》12(2013):102。
- [Qi, Jianqing. "The Three Rivers Basin." *Literatures of Nationalities* 12(2013):102.]
- 撒玛尔罕 “山那边的世界”,《西部》2(2012):90。
- [Samaerhan. "The World beyond the Mountain." *The West* 2(2012):90.]
- 萨娜 “达勒玛的神树”,《当代》2(2007):152。
- [Sana. "Dalema's Divine Tree." *The Contemporary* 2(2007):152.]
- 铁穆尔 “失我祁连山”,《延安文学》5(2004):163-65。
- [Tiemuer. "The Lost of My Qilian Mountains." *Yan'an Literature* 5(2004):163-65.]
- :“狼啸苍天”,《延安文学》12(2002):118。
- [---. "The Wolf Howling at the Sky." *Yan'an Literature* 12(2002):118.]
- 妥清德 “一年中的最后一天”,《诗刊》3(2011):39。
- [Tuo, Qingde. "The Last Day of the Year." *The Poetry Journals* 3(2011):39.]
- 乌热尔图 “丛林幽幽”,《你让我顺水漂流》。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6 年。
- [Wureertu. "The Deep Jungle." *Let Me Drift with Water*. 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1996.]
- :“你让我顺水漂流”,《你让我顺水漂流》。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6 年。
- [---. "Let Me Drift with Water." *Let Me Drift with Water*. 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1996.]
- :《呼伦贝尔笔记》。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 年。
- [---. *The Notes about Hulunbuir*. Hohhot: Inner Mongolia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4.]
- :“萨满 我们的萨满”,《你让我顺水漂流》。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6 年。
- [---. "The Shaman, Our Shaman." *Let Me Drift with Water*. 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1996.]
- 肇嘉 《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张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
- [Zoja, Luigi. *The Father: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Trans. Zhang Ming,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6.]

(责任编辑:王 峰)